從遺址發掘到展示：對於淇武蘭遺址公園的幾點想法

陳有貝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助理教授

一、前言

所謂考古學發掘，向來被認為是開始於學術問題的研究，歷經田野考古調查、試掘、正式發掘、資料處理與分析，最後達至發掘報告的完成，只是近來這個定義似乎有點改變。在台灣，由於文化資產日漸受到重視，配合著各地博物館的快速成長，使得供應博物館典藏與陳列展示的考古學者也不得不重視這個趨勢，進而將所謂考古發掘的內容定義延伸至考古遺物的展示。無論現代的考古學者是被動地參與博物館的展示設計，或是主動地規劃展示的主題，這兩個領域的密切關聯是無庸置疑的。

這個趨勢當然有其正面的意義，因為讓考古學者體認到發掘與研究之外的考古遺址遺留的另一種功能　而另一方面，從事博物館工作的人員也藉由研究學者的加入，瞭解到客觀的學術資訊，並思考如何傳導至一般大眾。

筆者從民國90年起參與宜蘭縣淇武蘭遺址的發掘，以及後續的資料整理工作，長期以來亦感受到發掘工作的最後一步乃在社會大眾，但筆者對博物館的概念可說毫無所知，故只能希望藉由本文提供一個發掘者的立場，以資作為未來任何展示規劃的另一種參考。

二、從淇武蘭的性質看展示

（一）淇武蘭遺址

淇武蘭遺址位於宜蘭縣礁溪鄉，地理位置約在呈三角形之蘭陽平原的北端頂點，遺址與海直線距離近4km，一般海拔約在2m左右。民國90年5月底，因縣政府進行「礁溪鄉得子口溪第六期治理工程」而發現，在確認這是一處屬於噶瑪蘭舊社系統的考古遺址後，為避免遺址受到工程擴大破壞，故一時暫停了部分的河川工程，委由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等單位進行遺址搶救工作。

因應不同工程進度，所有搶救工程分階段實施，最後結束於民國92年，共計發掘面積達3750平方公尺（陳有貝，2002；2004）。

從各種研究角度看來，淇武蘭遺址極可能是噶瑪蘭民族所遺留，但是除此之外，進一步的文化內涵與意義都需要靠未來長期的研究，所幸遺址的遺留條件極佳，對於學術上的研究將極有助益。但是，也是因為淇武蘭有著豐富的遺留，自然使得我們必須考慮到這批遺留的去處，若是如以往，在一般的考古遺物被研究過後，恐怕只能置於倉庫一角，這絕對不是任何一位現代國民所願看到的。配合著我們目前的社會現狀，廣設的博物館或許是淇武蘭遺留的去處之一，但是此一形式是否即是淇武蘭的最佳處理方式，種種問題其實都應該再仔細檢討。

（二）淇武蘭的考古遺留

要考慮淇武蘭遺留的最佳去處，便要先瞭解淇武蘭的意義。筆者過去曾經提到淇武蘭有完整、多樣且堆積有序的地層是本遺址最特別與珍貴之處，這是純就一個考古遺址本身的條件而言，另外也提到就民族學上的意義，如可對文獻中的噶瑪蘭舊社進行確認，並藉其生態環境、家屋建築、生活器物、墓葬行為等完整的文化脈絡，了解其文化內涵的持續與變遷，並進一步討論淇武蘭社與外來族群的接觸與互動過程（陳有貝，2002）。